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

李宗正主編

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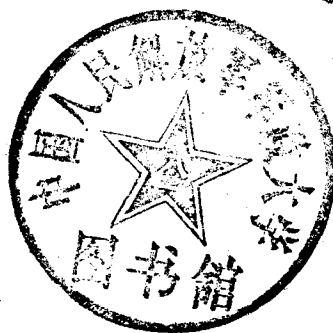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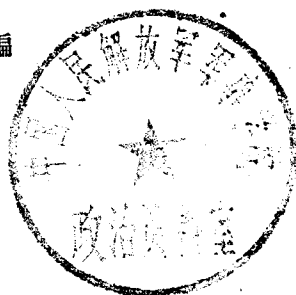
F091.3

30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

李宗正主編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
李宗正主編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人民美術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9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 $\frac{1}{4}$ · 字數 50,000

1963年10月第1版

1964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統一書號 K4001·282 定價（六）0.27元

印數 1,501—5,200

前 言

十九世紀最后三十年是資本主义处于暫时的“和平”发展的时期。欧美主要的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資本主义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新兴的資本主义国家如德国和美国的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一些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資本主义經濟的发展加速了生产积聚和資本集中，結果引起了壟断組織的广泛发展、資本輸出和殖民地掠奪的加强。到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各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完全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

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資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也发展了，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争进一步尖銳化。1871年，在法国爆发了巴黎公社起义。巴黎公社起义是无产階級推翻資本主义制度的第一次偉大的尝试。在巴黎公社革命之后，資本主义各国工人运动迅速地发展和壮大，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获得了偉大的胜利。西方許多国家都創立了无产階級政党。国际工人运动和階級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馬克思主义的胜利和工人运动的高漲，引起了資產階級的恐惧和仇視。他們除了繼續实行暴力鎮压之外，还采用一些改良政策和收买工人貴族等办法，企图借此来削弱和分化工人运动。在思想战綫上則集中火力来攻击馬克思主义。

在政治經濟学領域內，以往的庸俗的理論已經不能完全适应資產階級反对馬克思主义經濟学說和工人运动的需要，階級斗争的发展使資產階級迫切需要創造一些新的辯護理論。因此在十九

世紀最后三十年，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中就出現了各種新的流派。在德國出現了新史學派。這一學派繼承了舊歷史學派的衣鉢，主張用“歷史歸納法”來研究政治經濟學，否定科學抽象，幻想用取消理論的辦法來消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為了抵制工人運動和麻痺工人階級的革命意志，新歷史學派又提倡社會改良政策，引誘工人群眾離開革命鬥爭的道路。與此同時，在西歐幾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出現了“邊際效用論”。“邊際效用論”的主要代表是奧地利學派。奧地利學派反對新歷史學派的一味否定理論的態度，提倡“抽象演繹法”。雖然這個學派標榜着恢復理論的研究，然而他們否認社會生產關係，閹割經濟範疇的社會階級內容，用個人的心理來解釋社會經濟現象，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特別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力圖證明資本主義制度是永恒的與和諧的。數理學派是邊際效用論的一個支流。它用高等數學來說明“邊際效用”這個庸俗理論。在這個學派的代表看來，經濟學所處理的乃是各種經濟事物數量之間相互關係問題，因此它可用數學來研究這種關係，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純粹的科學”。他們企圖用對經濟現象的表面關係的分析來代替對社會生產關係的分析，掩蓋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由於“邊際效用論”當時主要通過奧地利學派的通俗說明而傳播開來，所以在这里我們只對奧國學派的理論加以批判，至於數理學派則在講授現代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時另行批判。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美國資本主義有了迅速的發展。當美國走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時，在英法等國家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已經採取了公開和對抗的形態，所以美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一開始就走上庸俗化的道路。美國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深受西歐的庸俗經濟理論的影響。在這個時期，美國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西歐的“邊際效用論”影響之下，出現了克拉克的庸俗經濟學說。克拉克利用“邊際效用論”宣傳階級利益調和的謬論，創立了一個以“靜態”分析為主和以分配論為中心的庸俗經濟思想體系。同時，在歷史學派的影响下，美國又產生了另一個稱為制度學派的新的庸俗派別。這個學派是歷史學派在美國的變種，是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中主張改良主義的一個派別。制度學派把歷史學派的“歷史歸納法”和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社會達爾文主義結合起來，提出了政治經濟學應該研究“制度途向”的說法，并肆意歪曲經濟制度的性質。

在十九世紀末，英國出現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劍橋學派。馬歇爾集庸俗經濟學之大成，他的經濟學說在長時期內一直成為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的主流。雖然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馬歇爾的經濟學說已讓位給凱恩斯主義，但是在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上，馬歇爾的觀點仍然在現代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中占著重要的地位。

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雖然出現了這種不同派別，甚至互相攻訐，然而它們都是用個人的主觀心理來分析社會經濟現象；它們採取不同方式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所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庸俗政治經濟學明顯地表現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腐朽和庸俗化的加深。

編者

目 录

第一章 新历史学派	1
一 新历史学派概論	1
二 施莫勒的經濟观点	3
三 讲坛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	8
第二章 奥地利学派	12
一 奥地利学派概論	12
二 边际效用价值論	15
三 时差利息論	20
四 龐巴維克对馬克思主义經濟理論的进攻	23
第三章 馬歇尔的經濟理論	26
一 馬歇尔經濟学說概論	26
二 均衡价格論	30
三 馬歇尔的分配論	36
四 馬歇尔为壟断組織和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辯护	39
第四章 克拉克的經濟理論	42
一 克拉克經濟理論概論	42
二 静态經濟学和动态經濟学	44
三 边际生产率論	47
四 克拉克为壟断統治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辯护	52
第五章 制度学派	55
一 制度学派概論	55
二 凡勃倫的經濟理論	56
三 康蒙斯的經濟理論	63
后記	66

第一章

新历史学派

一 新历史学派概論

德国新历史学派是德国旧历史学派的继承者。其主要代表为施莫勒。施莫勒之外，路約·布倫坦諾、阿道夫·瓦格納、維爾納·桑巴特等也是这一派的重要人物。

新历史学派是十九世紀末德国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在普法战争和德国统一之后，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愈益加快。在八十年代，德国的工业产量已居世界的第三位，工业发展的速度超过了英法两国。德国若干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已达到高度集中，出现了垄断组织。和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德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也在迅速地发展。农村分化剧烈，广大小农陷于破产，他们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后备军。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引起了新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剧烈竞争，使德国和英法两国以及和它同时兴起的美国之间发生了矛盾。德国资产阶级力图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据优势和支配的地位。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工人阶级不断壮大，工人运动也日益发展。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中指出，1869年以来，德国资本主义工业空前的发展，终于有了世界贸易、真正的大

工业和真正的現代資產階級的同时，也发生了真正的危机和真正强大的无产阶级。在德意志帝国形成时，德国工人階級的政党曾分裂为机会主义的拉薩尔派和受馬克思指导的爱森納赫派。七十年代初工人运动的发展，要求成立一个統一的政党。但是，爱森納赫派沒有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在1875年于哥达城召开了兩派代表會議，在对拉薩尔的机会主义观点让步的情况下实行了統一，制定了綱領。虽然哥达綱領犯了严重的原則性的錯誤并受到馬克思的严厉批判，但是德国工人运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影响下仍然繼續地发展。工人运动的发展使德国資產階級大为震惊。1878年，俾斯麦經過国会，制定了鎮压工人运动的“非常法令”。然而，俾斯麦的殘酷鎮压，並沒有达到自己的目的，1890年举行国会选举时，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很大的胜利，工人階級政党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拥护。在选举之后，德国政府被迫放棄这个反动的法令，轉而采取改良的手段，企图借此来欺騙工人，引誘他們脱离階級斗争。新历史学派就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在德国产生的。

新历史学派是继承旧历史学派的衣鉢成长起来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新历史学派担负着和旧历史学派不同的反动使命。旧历史学派出現在十九世紀中叶，当时德国剛剛走上資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落后的德国經濟不能和先进的英法两个資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为了維護德国資本主义的发展，旧历史学派反对古典政治經濟学的自由貿易学說，主張国家干涉經濟和保护关税政策。与此同时，他們也反对当时已經广泛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新历史学派則是在德国資本主义高度发展、工人运动日趋高漲和馬克思主义广泛傳播的年代出現的，因此他們的主要任务是在于反对工人运动和馬克思主义，宣傳改良主义政策，防止劳动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

新历史学派继续宣傳应用历史归纳法作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他們所吹嘘的历史归纳法的特点，是否认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普遍的客观规律，反对在经济研究中作理论概括和寻找客观的发展规律，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只是搜集和叙述各个民族的经济资料，寻找出适合于各民族国家的独特发展的道路。新历史学派和旧历史学派在方法上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他們更加强调经济研究不应从事理论概括，而应该集中力量搜集历史经验的材料；其次，他們强调在搜集历史材料时，必须利用统计学方法并且标榜自己的方法是历史统计方法，企图为自己的历史归纳法披上科学的外衣。此外，新历史学派比旧历史学派更加走上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道路，宣扬心理和伦理对社会经济发展起有决定的作用。

新历史学派的反动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德国法西斯思想体系的来源之一。它在资本主义各国，特别是在美国，得到了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拥护。德国修正主义者也深受它的影响。伯恩斯坦就公开承认他的思想受过布倫坦諾的影响。

二 施莫勒的经济观点

施莫勒是新历史学派的首領，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柏林大学担任教授。1893年，施莫勒在为康喇所編的《国家学辞典》撰写的《国民經济、国民經济学及其方法》一文中对新历史学派的观点曾作了概括的論述。在1900至1904年，他又連續出版了《国民經济学原理》一书，这本书是施莫勒的主要经济著作。

施莫勒认为，国民經济是为統一的民族精神和物质原因所支配的一个民族的经济和社会的統一組織。在十七世紀后，由于国家統制和行政上的必要，国民經济学逐漸形成为独立的科学。按

照他的說法，這門科學所研究的中心內容，是對受心理決定的分工、勞動編制、交通、所得的分配以及社會和經濟的材料等，加以一般記載；然後再考察各個國民經濟相互之間的差別和它們的不同組織形態，探討不同形態之間怎樣結合和怎樣表現出來。施莫勒認為只有作這樣的探討，才能夠了解國民經濟的歷史發展的概念。

施莫勒極力強調經濟研究只應從事歷史的和具體的經驗資料的搜集和分類工作，不應該從事理論的研究。他表示經濟學家沒有能力發現歷史發展規律，也不可能確立人類經濟生活的任何統一要素或一致發展的任何根據。施莫勒反對應用抽象法來研究社會經濟現象以及應用這種方法所建立的理論。按照他的說法，這種理論是蒼白的抽象和枯死的形式的東西，不能指示出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因和正確的關係。在這一點上，施莫勒甚至對舊歷史學派的否認經濟理論的態度還感到不夠徹底，他說舊歷史學派一向急於依據世界歷史的事實下結論，我們現在認識到，惟有對經濟史的細節進行艱苦細致的考察，才能從經濟和社會政治方面為歷史研究以及確立國民經濟理論提供適合的基礎；他還認為，新歷史學派和羅雪爾的差異是在於他們比較不急於普遍化，而感覺必須由事實的廣泛的搜集，而進行種種時代的民族經濟形態的特殊研究。

不难看出，施莫勒所主張的歷史方法是旨在取消政治經濟學這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和一切社會科學一樣，不能像物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那樣應用實驗方法，而要用抽象方法來分析社會經濟的現象。抽象方法決不是如施莫勒所說的那樣，是拋棄了一定社會制度下的各種具體特點只涉及一般的空洞議論。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恰恰是反對空洞和一般的理論，而是在複雜的社會經濟現象中找出該社會所特有的、構成該社會整體的各種基本關係，把

这些主要因素抽象出来，加以分析，这种科学的抽象法深刻地反映出这个社会的内部关系以及和它密切联系的现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应用抽象法来分析資本主义社会經濟形态，揭示了資本主义的发展規律及其作用的具体情况，指出了它在經濟生活表面上的表現。相反地，历史学派在必須搜集資料和研究个别制度的借口下，否认一般經濟規律的存在，否认应用抽象法研究經濟現象的必要性，拒絕进行理論上概括和探寻經濟現象的内部联系。新历史学派片面地強調各个民族經濟发展的特殊性，同时只停留在对經濟現象表面的描述上。所以，新历史学派的代表虽然写了一些經濟著作，例如施莫勒就发表了《十九世紀德意志工业史》、《斯特拉斯堡的紡織业》、《十八世紀普魯士的經濟政策》等，但所有这些著作只是罗列和堆积經濟資料，描述表面現象，一团混乱，对社会經濟发展不能提出任何科学的解釋。列宁指出：“为了解决社会科学問題，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問題的本領而不致糾纏在許多細節或各种爭执意見上面，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問題，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現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現在是怎样的。”^① 历史学派所标榜的历史方法恰恰就是糾纏在細節，舍棄了如列宁所指出的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基本历史联系，所以这种历史方法和科学的历史方法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施莫勒所以反对抽象法，拒絕探討社会发展的規律，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原因的。因为馬克思的《資本論》科学地揭示了資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規律，指出資本主义制度內在的不可調和的对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0頁。

抗性矛盾，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施莫勒一味拒絕研究社会經濟发展規律，是由于他害怕人們知道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害怕劳动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統治的斗争。

主观唯心主义是施莫勒經濟理論的显著特点。他认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在人类、民族、階級和社会成員的内部情感、冲动和意見的一致基础上形成的。經濟研究必須注意研究人的感情、观点和行为的傾向，注意人的心理的分析。在他看来，經濟生活是出于一定人們的冲动，为了知道一般的經濟行为的原动力就必须研究心理及历史。施莫勒經常強調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政治經濟学的重要性。

施莫勒不仅主張政治經濟学是心理的科学，而且认为它是一门倫理学的科学。他曾声称旧历史学派乃是研究經濟現象的自然的技术，新历史学派則探究由一个民族的心理的道德生活所发生的原因。施莫勒认为在經濟生活中，人类虽然需要外界的財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然而誰也不会仅仅限于这种自然的技术关系，而是要进一步地为了满足高尚的完善的欲望，或者說为满足倫理的意向而努力，因此社会經濟組織不过是經濟規範和倫理所制約的一种秩序。經濟問題只有和倫理道德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說明。所以，他公开地把自己的經濟理論称为“历史的倫理学派”。

显然，施莫勒这些謬論完全歪曲了社会經濟发展規律，顛倒了人們的社会存在同人們的意識的关系，顛倒了上层建筑 and 基础之間的关系。施莫勒所謂的心理、感情、冲动、行为的傾向等等，指的都是人們的意識。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不是人們的意識决定人們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意識。人类社会經濟制度不是由上层建筑决定的，恰好相反，正是人类的社会經

济制度决定着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制度，才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就伦理道德来说，它乃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是有阶级性的。伦理道德并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随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农奴主道德也就让位给资产阶级的道德。列宁写道：“占有固着于土地上的农奴的剩余劳动的制度树立了农奴主的道德，‘靠别人养活’来做工、为货币占有者来做工的‘自由劳动’的制度树立了资产阶级的道德而取消了农奴主的道德。”^①施莫勒力图把伦理道德确定为永恒的原则，是出自人类本性的支配社会发展的动力。他的这种观点是反科学的。

施莫勒在经济理论中玩弄心理、感情、伦理道德等概念，是隐藏着反动意图的。施莫勒否认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所以他就极力搬用诸如心理、道德这类的范畴来迷惑人们，使人们对社会经济发展完全陷于神秘和不可知状态。除此之外，把经济关系说成是伦理道德关系，这样又可为所欲为地把资产阶级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奴役关系，曲解成不过是基于伦理道德上的关系，鼓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矛盾，可以通过伦理道德的调解而得到解决。

在施莫勒著作中，还反对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主义，强调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决定作用。前面说过，施莫勒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为了国家统治和行政上必要而产生的。他还说国民经济乃是法律的统一体，国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另一个新历史学派的代表瓦格纳则声称个人经济地位不仅取决于自然权利，而且决定于法律制度。他们都强调必须扩大国家职能，来增进社会的文明和富庶。新历史学派强调国家的作用，一方面是企图借国家力量来保证

^①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61页。

德國資產階級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競爭的勝利，以及實行對外的擴張侵略政策；另一方面則企圖依靠資產階級國家的力量來調和階級矛盾，鎮壓勞動群眾的反抗，加強對勞動群眾的剝削和壓迫。

三 讲坛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

在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界中，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和新歷史學派之間因為對採取辯護方法的意見不一致，雙方經常發生論爭。1871年，瓦格納在其“社會問題”演講中就攻擊德國曼徹斯特學派忽視勞資矛盾，認為應該對貧富懸殊和勞資矛盾問題加以解決。翌年，德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奧本海姆發表了《曼徹斯特學派和讲坛社会主义》一文對歷史學派作了“批評”。在這一篇文章中，奧本海姆把讲坛社会主义稱號加於新歷史學派代表的頭上，於是人們就把新歷史學派在讲坛上所宣傳的社會改良政策稱為讲坛社会主义。

1872年，在新歷史學派主要人物的發動下，召開了愛森納赫會議。1873年，他們組織了一個社會政策協會。讲坛社会主义的反動本質，在愛森納赫會議上，施莫勒所致的開幕詞中已暴露無遺。施莫勒說道：我們“一致信奉一個國家觀。……把國家致於歷史的生產的潮流之中，認為國家的使命是隨文化狀態的程度如何而變化，有時狹小，有時廣大。……國家是教育人類的道義的制度。”施莫勒還說道：“……勞動者所穿的衣服，當然現在較好，所得食物，當然更佳，今日勞動者，恐已不復如過去數世紀的餓死無葬。……最重要的問題還是現在多數勞動者的生活條件，能否促進他們道德與經濟的進步。”施莫勒還認為大多數的勞動者和資本家階級之間的激烈對立，不是經濟狀態的對立，而是情感、教養與思想上的

罅隙。

从这一段中，可以看出，讲坛社会主义完全是以新历史学派的反动经济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社会分为两个基本阶级，即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并靠剥削剩余价值而生活的资产阶级，和没有任何财产与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是對抗性质而不能调和的，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获得解决。但是，讲坛社会主义者们却把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关系，归结于只是感情，教养和思想的差别，似乎只是由于无产阶级的教养不够，才在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这样一来，讲坛社会主义者们不仅逃避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而且把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一切灾难的责任都强加在劳动群众的头上。所以，他们荒谬地把所谓促进道德以及改善教养和心理状态作为自己“社会主义”活动的出发点和基础。

在上述一段话中，讲坛社会主义者还认为国家是取决于所谓文化状态的程度，抹煞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它的作用，荒谬地把它描绘为“教育人类的伟大的道义的制度”。讲坛社会主义者这样费尽

① 《列宁全集》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2—383页。

心机歪曲資產階級國家本質，把反動的普魯士國家打扮成為超階級的偉大的道義的制度，為的是替國家可以調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矛盾的謬論製造根據。以後的德國法西斯的國家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導源于讲坛社會主義的這種反動思想。

讲坛社會主義者公開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施莫勒在愛森納赫會議的開幕詞中公開地聲稱：“社會主義不是我們的社會的理想。我們認為在社會生活中是有種種等級的，並且以為一個社會，容易由一階級移到另一階級，是很正當的，健全的，但是現在的社会，正如上下各趨極端，中段又被破壞，只存在上段與下段踏腳板的一架危險的梯子。”“我們雖不滿意現社會的諸關係，深感改良的必要，但是我們不是就要改變一切科學，打破現存的關係。我們反對一切社會主義的實驗。我們知道，歷史進步是數世紀勞作的結果。我們更知道現存的东西，對於新的东西有一種幾乎不能戰勝的強烈的抵抗力。因為現存的东西，在大眾的信念與習慣上有其基礎。我們在一切方面承認現存的东西，即以改革經濟立法、現有生產形態、各種社會階級現存的教養與心理的狀態的基礎，為我們活動的出發點。”由此可以看出，讲坛社會主義者實際上是打着社會主義旗幟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他們的目的不是推翻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而是竭力保護這個制度不受侵犯。從改良主義出發，讲坛社會主義者們把工廠法、實行社會保險、修改稅率等等都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措施。他們把普魯士政府所實行的鐵路國有政策以及俾斯麥所計劃的烟酒國家專賣政策，都說成是國家社會主義。所以，讲坛社會主義者事實上又是俾斯麥所實行的欺騙性的改良政策的辯護士。恩格斯指出：“我們的讲坛社會主義者在理論方面從來都不比那些帶有一點博愛主義傾向的庸俗經濟學家高明，而現在他們簡直已經墮落到俾斯麥的國家社會主義的辯